

从古英诗《创世记》对《圣经·创世记》的改写 看日耳曼传统的影响

肖明翰

内容提要: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于7世纪逐渐皈依基督教后,日耳曼文化传统在英格兰仍然保持着强大影响。古英语文学,包括宗教文学,突出地反映出这种影响。古英诗《创世记》取材于《圣经·创世记》,是以宣传基督教思想为主旨的重要宗教诗,但诗人在细节增删、情节描写和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对《圣经》故事做了相当程度的改写,自觉和不自觉地表达了各种日耳曼价值观念。诗人的改写表明,日耳曼文化传统渗入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思想处于共存与融合的动态关系之中。

关键词:《创世记》 古英诗 基督教 日耳曼传统

中图分类号:G0;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5-0080-10

从6世纪后期开始,罗马教庭和爱尔兰教会分别从南北方向在英格兰传教,其间几经周折,终于在近百年之后,盎格鲁-撒克逊人逐渐皈依了基督教,英格兰地区重新回归基督教世界。然而,那并不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人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日耳曼文化传统的终结。实际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日耳曼文化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一直保持着强大影响。在那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不仅基督教一直在努力对日耳曼文化传统进行斗争和改造,而且日耳曼思想观念反过来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基督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后来的英国文化实际上是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传统的融合与发展。

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基督教对日耳曼文化的斗争与改造总是旗

帜鲜明。相反,日耳曼价值观念对基督教的“侵蚀”有时却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在不知不觉中进行,那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因此往往不易被觉察和阻止而进入权威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流传下来的古英语文学(即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文学)主要是宗教文学,原因很简单,当时能进行创作、记录和抄写的所有知识分子几乎全都是教堂的神职人员或修道院的修士。然而在几乎所有古英语文学作品里,包括那些以宣传基督教思想为主旨的宗教诗篇里,日耳曼思想文化的影响、日耳曼价值观念的表现可以说比比皆是。即使是在讲述《圣经》故事的诗篇里,日耳曼传统观念也以各种形式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

《圣经》对古英语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古英语诗歌里有大量诗篇直接取材于《圣经》。盎格鲁-撒克逊诗人对《旧约》故事似乎特别偏爱,从篇幅上看,在现存所有三万余行古英诗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程度不同地取材于《旧约》。(Godden: 206)在这些涉及《旧约》的诗里,有四首是直接讲述《旧约》故事的长篇叙事诗。诗人们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口头诗歌形式^①向大众讲述《圣经》故事,给他们灌输基督教思想,教育他们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这些诗歌体现了基督教精神,在情节事件上与《圣经》故事大体一致,所以它们往往被看作是对《旧约》故事的“意释”(paraphrase)。但诗人们在不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前提下,经常自由发挥想象力,增添了许多十分生动的细节和场面,甚至塑造出原故事中没有或不同的人物形象。往往正是这些超越了意释的部分最为精彩,艺术成就最高。同时也正是在这些部分,日耳曼文化传统表现最为突出。在相当长时期内,人们把这些《旧约》诗仅仅看作是对《圣经》故事的意释,是为那些没有文化的民众创作的宗教普及教材而已,没有什么文学价值。这显然是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些《旧约》诗而下的轻率结论。

在古英语《旧约》诗篇里,《创世记》最受人们重视。这部2,396行的诗作大约创作于8世纪,叙述的主要是《圣经·创世记》从第1—22章的内容,也就是从上帝创造世界到亚伯拉罕遵照上帝旨意,用独子以撒祭献上帝。然而这只是就主要情节事件而言,在细节上诗人做了相当多增删,在人物塑造上更是尽情发挥想象力。诗人所做的增删和在人物形象上的大胆改动不仅表现出他的想象力和诗歌艺术,也表现了日耳曼传统对他的深刻影响。

诗人的增删往往是为听众考虑。比如,《圣经》详细记述了亚当和儿子该隐的代谱和寿命,诗人对此大幅度删节,那显然是因为冗长的代谱枯燥无味,听众不感兴趣。更有意

义的是他对第14章的处理。在《圣经》里,第14章的开头关于“四王与五王”作战那一大段包含大量陌生的人名和地名,不仅没有文化的听众、就是有文化的阅读者也往往会一头雾水。所以除了所多玛和罗得等几个必须的地名和人名外,诗人把其他所有的专用名词全都删去,而代之以“北方人”和“南方人”,使听众易于理解。^②相反,对于部族之间的冲突和战斗场面,诗人则浓墨重彩,尽情发挥。诗里许多最精彩的细节描写和具体的战斗情节全是诗人的妙笔。比如,“许多面色苍白的男人/不得不浑身战栗地走向陌生的怀抱”;(1969—70)^③战场上“死亡的游戏,致命枪矛的相互刺杀,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惊心动魄的打斗”(1989—90)等等,都是《圣经》中所没有的。另外,这样精彩地描写战斗场面,显然是受到日耳曼英雄史诗传统的影响,是日耳曼民族的尚武精神的表现。

在表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价值观念和尚武精神方面,《创世记》里特别突出的是关于亚伯拉罕^④率兵报仇,打败北方四王,救回侄儿罗得那一部分。在《圣经》里,整个事件十分简略,仅有四句,至于战斗,只用了半句:“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没有任何细节。但在古英诗《创世记》里,诗人根据日耳曼英雄诗歌传统,任由想象力驰骋,好像是在讲述日耳曼英雄的事迹。他增加了大量细节,把这场战斗写得惊心动魄,生动地表现出亚伯拉罕和勇士们的英勇和机智,这段故事因此而长达七十八行(2018—2095)。这是诗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亚伯拉罕和他那些忠心耿耿的部下英勇杀敌的英姿更像是日

① 吟唱诗歌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里很普遍的娱乐形式和传教方式。

② 古英诗《创世记》里关于“四王与五王”之战的描述见该诗第1960-2017行。

③ 本文中古英诗《创世记》的引文均出自克拉普(Krapp)所编 *The Junius Manuscript*, 译文参考了几种现代英语译本。以下诗行数码随文注出。

④ 《圣经》中为亚伯兰。亚伯兰在九十九岁时上帝赐名,改为亚伯拉罕。见《圣经·创世记》17:1—5。

耳曼首领和武士。如果我们忽略人物名字,那么不论从情节描写还是从语言和叙事风格上看,这一段都更像日耳曼英雄史诗。

除忠诚和勇敢之外,日耳曼文化传统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财产观念。盎格鲁-撒克逊人极为重视财产和财产的赏赐,把那看作是社会地位的体现和维系部族关系的纽带,史诗《贝奥武甫》和其它许多古英诗作品都十分突出地表现了这一传统的日耳曼价值观念。古英诗《创世记》里,武士们被称作“新娘与财物的卫士”,君王被尊为“黄金的赏赐者”和“财物总管”等,这些都是英雄史诗中带有日耳曼价值观念的话语。相比之下,基督教则更重精神而轻物质财富。《圣经》在记述亚伯拉罕的这场战争时,只是在战争结束后顺便提到胜方“掳掠”了败方的“财物”。然而在古英诗《创世记》里,不仅财物被提到多达十一次,而且这些词汇出现在从战前到战后的全过程中,其重要性大为增加,显然已不仅仅是《圣经》里一笔带过的战利品。在《圣经》里,战争的原因是:南方五王“已经侍奉基大老玛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但在古英诗里,“侍奉”被具体化为“向北方人纳税朝贡”,而“背叛”更被明确地说成是“再也不愿”交纳“财物”。这样,“财物”实际上成了战争根源。在另一首《旧约》诗《出埃及记》里,诗人以死里逃生的犹太人分配战利品的日耳曼习俗来结束诗作,而这是《圣经·出埃及记》中完全没有的。在这些作品里,诗人有时似乎忘记了他在写《旧约》故事,所以在不知不觉中用日耳曼人代替了犹太人,这显然也是日耳曼价值观念不自觉的流露。盎格鲁-撒克逊诗人对财物如此重视,明显和基督教精神不一致。这表明,宗教诗人们在创作中受日耳曼价值观念影响,有时会不自觉地偏离宗教原则。

但这还不是古英诗《创世记》最具原创性的地方。这首诗里最具原创性也最吸引人的

部分是诗中关于撒旦的反叛和人类的堕落这两个核心事件的描写,以及在这两部分里对撒旦和夏娃这两个关键人物的塑造。正是这些偏离《圣经》最远的部分,特别是对撒旦和夏娃的塑造,最充分地反映出诗人的高超诗艺和日耳曼文化传统对他的重大影响,从而使这部讲述《圣经》故事的诗作成为英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很可能还直接影响了英国文学后来的发展,特别是密尔顿对《失乐园》的创作。

在古英诗《创世记》的开篇,诗人用了一百多行的篇幅来讲述撒旦的叛乱和天堂之战,而这些都是《圣经·创世记》里所没有的。诗人运用日耳曼英雄史诗的风格叙述基督教传说,生动地讲述了天堂之战:那些本来在天堂享受永恒幸福的天使因为撒旦的骄傲而同他一道反叛,上帝发“雷霆之怒”,“高举他至高无上的手”,用他“无穷之威力”,“摧毁了他的仇敌”,“剥夺了这些行恶者”的“光荣与幸福”,将他们“赶出天堂”,抛入地狱,“淹没在永恒黑暗之中”,“遭受灼热和突降的严寒, / 烟雾和熊熊烈焰无尽的折磨”。(41—64)

不过在这首诗里,最令人赞叹的是从第235—851这617行。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创世记》是一首统一的诗,但在1875年,德国著名学者西维尔斯经过仔细研究和考证,认为不论从格律、风格还是从词汇上看,这些诗行同其他部分都大为不同;不仅如此,它们甚至和其他古英诗也有差别。因此他认为,这部分实际上是从一首已经散失的古撒克逊语^①诗歌翻译过来,嵌入这首诗中。他的推测在十九年后奇迹般地得到证实。1894年,梵蒂冈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在一部古手稿里发现了一个9世纪的诗歌爱好者抄写在书中空白处的一些古撒克逊语诗歌段落,其中一段正

^① 人们称已经移居英格兰的撒克逊人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而称那些仍居住在北欧大陆的撒克逊人为古撒克逊人(Old Saxons),以示区别。古撒克逊语就是指那些在北欧大陆的撒克逊人的语言,属古日耳曼语。

好与古英诗《创世记》里第 790—817 行相符。

现在,古英诗《创世记》已被公认为是由两首诗组成:由古撒克逊语译过来的这六百多行被称为《创世记 B》,而其余部分则被命名为《创世记 A》。在这两部分中,《创世记 B》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它从上帝吩咐亚当和夏娃不可偷吃禁果开始,进而叙述撒旦的反叛、失败和他决心复仇的阴谋,接着讲述亚当和夏娃在魔鬼引诱下偷吃禁果、失去乐园的故事。除上帝的禁令、魔鬼的诱惑和人类祖先偷吃禁果这一主干情节外,这部分绝大多数内容和几乎全部细节都是《圣经·创世记》里所没有的。在创作几乎等同于翻译、改写和意释的中世纪,《创世记 B》充分反映出诗人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它还表现出诗人一些十分独特的观点。可以说,它是所有古英语《圣经》文学里最富想象力、最具特色的诗篇。

在《创世记 B》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诗人塑造了一个在所有中世纪欧洲文学中唯一的十分特殊的叛逆英雄的形象。这个“英雄”不是别人,正是基督教世界天字第一号的罪魁:撒旦。当然诗人并没有也不会称撒旦为英雄,他是用撒旦自己的话语来表现他不愿屈从神权、誓与上帝一争高下的大无畏气概:我不需要主人,我的双手同样能创造出各种奇迹,我拥有伟大的力量,可以在天堂建造更辉煌的宝座,我为什么要期待他的恩赐?我和他一样能成为上帝。坚定的战友,勇敢的武士们,他们将和我共同战斗,永不背叛,我是这些无畏英雄之领袖。(II. 278—85)

即使在地狱的煎熬中,他仍然决心继续他与上帝之间的斗争,宁愿统治地下“王国”,也“决不俯首称臣”,并迅速策划出如何向上帝复仇的阴谋,充分反映出他不屈不挠的反叛

性格。在这里,撒旦与其说是罪恶的化身,不如说更像一个在争夺王位中失败了了的日耳曼英雄。这样的冲突不论在《贝奥武甫》和其他英雄史诗中,还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现实里都屡见不鲜。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主要并非基督教所谴责的各种罪恶,而是日耳曼价值观念和日耳曼英雄气质。

撒旦在地狱里那长达 87 行(356—442)的独白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段落。任何一个熟悉英国文学史的读者在读到那些表现他坚强的叛逆性格的诗句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密尔顿在《失乐园》里塑造撒旦那令人称道的高大形象的著名诗行。密尔顿的撒旦在被打入地狱之后同样表达了永不向上帝屈服的英雄气概:

……我们损失了什么?

并非什么都丢光:不挠的意志、
热切的复仇心、不灭的憎恨,
以及永不屈服、永不退让的勇气,
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难战胜的呢?
他的暴怒也罢,威力也罢,
绝不能夺去我这份光荣。

……

这时候还要弯腰屈膝,向他
哀求怜悯,拜倒在他的权力之下,
那才是真正的卑鄙、可耻,
比这次的沉沦还要卑贱。(密尔顿:8)

同古英诗里的撒旦一样,他不愿做上帝的奴仆,要做自己的主人。他说:“与其在天堂里做奴隶,/倒不如在地狱里称王。”(密尔顿:14)

密尔顿的《失乐园》和古英诗《创世记 B》之间的相似之处还不仅仅在撒旦的塑造上,它的基本内容乃至其情节安排的走向也与《创世记 B》大体一致:它们都是从反叛的天使被打入地狱开始,进而描写魔鬼为复仇到乐园引诱亚当和夏娃背叛上帝,最后人类因为违反上帝禁令而遭受惩罚,被逐出乐园。

另外,在一些细节上它们也不无相似之处。比如,《创世记 B》为了表明地狱的恐怖和深不可测,特别说明反叛的天使们从天堂到地狱掉了三天三夜,而密尔顿只是将其改为九天九夜而已。

关于密尔顿的《失乐园》与《创世记 B》之间的关系问题,许多评论家都曾提及。他们认为,虽然没有记载表明密尔顿读到过《创世记 B》,但在17世纪中叶,也就是在密尔顿成为清教革命积极活动者的时期,古英语《旧约》诗篇手抄稿的拥有者朱尼厄斯(Francisus Junius, 1591—1677)正好在伦敦,而且他于1654年编辑出版了手抄稿中的四部古英语诗。(Hanford: 227)因此,密尔顿很有可能认识他甚至读到过《创世记 B》。^①密尔顿塑造的撒旦那具有英雄气概的叛逆形象后来对英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在那些同样具有叛逆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思想和作品里,而且在英美哥特小说里那些超乎常人的所谓“恶棍英雄”(villain-hero)身上,都明显地闪现着这个叛逆者的影子。如果密尔顿读过《创世记 B》,那么古英诗塑造的撒旦身上那种叛逆精神很可能在同样具有叛逆精神的这位革命诗人心中产生了共鸣,他因此受到这部古英诗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后来又在英国文学的发展中发扬光大,并进一步推动了英语文学的发展,形成了英语文学中一个特有的传统。

《创世记 B》另一个特别值得称道之处是对撒旦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撒旦的长篇独白是英国文学中心理表现的早期经典。其中最突出的是,诗人通过撒旦的话语揭示出,叛乱的天使们虽然在地狱里受到烈焰和其它酷刑的折磨,但撒旦最不能忍受的还不是被赶出天堂打入地狱,甚至也不是地狱里的煎熬,而是因为上帝新创造的人类享受着他认为本该属于他的荣誉和幸福。他说:“我最大的悲痛是,那个用泥巴捏的/亚当将居然坐在我那高

贵的宝座,/生活在极乐之中,而我们/却在这地狱里遭受苦难和折磨。”(ll. 364—67)所以,他最难以忍受的是无法平抑的愤怒,是吞噬着他心灵的嫉妒,是因为当他想到上帝的新宠、那个为他所瞧不起的“泥巴捏”的亚当,竟然在享受着本该属于他的幸福而遭受的内心折磨。

诗人强调撒旦的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折磨并非来自《圣经》或基督教神学,而是来自对人的内心世界的体验和认识。撒旦的这种满怀嫉妒的心态使他更像一个现实中的普通人,这是中世纪文学中少有的对人的心理和人性的展现,是诗人的独到之处。不仅如此,撒旦引诱人类堕落还因此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基督教通常认为,魔鬼引诱亚当和夏娃背叛上帝主要是为了复仇,因为他无法直接向上帝挑战,只能靠毁灭上帝所喜爱的人类来间接打击上帝。但在《创世记 B》里,由于诗人特别强调了撒旦因那个“用泥巴捏”的卑贱的亚当和夏娃夺走了并享受着本属于他的幸福和荣耀而产生的忿懣之情,因此引诱人类犯罪就不仅仅是向上帝复仇的手段,人类本身也成为他打击的对象。如果人类违背上帝禁令,他们就会失去上帝的宠爱,也将到地狱里来和魔鬼们一道受折磨。这样,撒旦自然也会感到好受一些。这也是这位中世纪诗人特别值得称道的深刻之处。所以对撒旦来说,引诱人类犯罪就具有了双重的意义。他对追随者们说,他们必须设法使他们[亚当和夏娃]抛弃对上帝的忠诚,让他们违背其谕令。他就会怒不可泄,赶走他们,他们就会寻找地狱,来到这可怕的深坑,追随我等。(ll. 402—06)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关于引诱者

^① 密尔顿早年计划创作一部关于亚瑟王的史诗,清教革命后改为创作《失乐园》,笔者猜测,那很可能与他读过这部古英诗有一定关系。

的身份问题。《圣经·创世记》只是提到引诱者是那比“一切活物更狡猾”的蛇，而基督教通常认为那就是撒旦本人，蛇也因此而成为撒旦的化身。密尔顿在《失乐园》里也是这样写的：撒旦飞过万千里的浩瀚宇宙，来到伊甸园，变成蛇进行引诱。但在《创世记 B》里，实施诱惑的却不是撒旦，而只是他的一个“使者”。这或许是因为，撒旦这个曾经是天上最尊贵的大天使不屑于屈尊去引诱一个泥巴捏出的人。如果是这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撒旦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同时也可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日耳曼荣誉观在作品中的无意流露。

《创世记 B》另外一个特别值得称道之处是对夏娃这个形象的塑造，这一点同样也与《圣经·创世记》和基督教正统思想有相当距离。无论是《圣经》还是《创世记 B》，无论是基督教的传统说法或者《失乐园》这样的文学作品，在有一点上它们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虽然夏娃先吃禁果，但那本身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魔鬼是否成功，人类是否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完全取决于亚当是否吃禁果。夏娃似乎仅仅是被作为诱使亚当犯罪的工具而已，这显然是男权文化的产物。但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圣经》里简短地叙述还是《失乐园》里高度艺术化的创作，相比之下，夏娃的形象都比亚当更为生动、有趣、复杂和丰满。在大多数宗教和文学作品里，亚当更像一个宗教观念的体现，^①而夏娃则给了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和艺术创作的余地。

不论是《圣经》还是基督教教会，历来都谴责人类、特别是夏娃，因虚荣作祟而犯罪，因为蛇告诉夏娃，如果吃了智慧果，“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3:5）他们犯罪，是因为想变得和神一样。虚荣也因此而位列基督教“七大重罪”（Seven Deadly Sins）之首，被看作是使人类失去乐园、到尘世受罪的根本原因。夏娃自然也遭教会同声指责，

并殃及所有女人。在中世纪男权社会里，在基督教意识形态统治之下，女人被看作是魔鬼的工具和人类堕落之原由而备受责难。每一个教堂的布道坛上都发出对女人无穷无尽的谴责之声：

女人被看作是地狱之门，万恶之源。她应该一想到自己是女人就感到羞耻，她应该为把各种诅咒带给了这个世界而不断忏悔，她应该为自己的服饰感到羞愧，因为那是她堕落的纪念。她特别应该为自己的美丽感到可耻，因为那是魔鬼最厉害的工具。（Leck: 338）

当然，所有的指责最终都指向夏娃这个“邪恶”的原型女人，人们把人世间一切苦难都归咎于她。

然而《创世记 B》的作者不同。他实际上是在尽量为夏娃辩护，而且他的辩护系统、全面，很有说服力。他辩护的中心思想是，夏娃决不是出于任何目的（当然也不是出于虚荣）而有意违背上帝旨意，她仅仅是因为受到蒙骗，她的过失是没能认清引诱者的真面目。而且就连她没能认清魔鬼的真面目也不完全是她的错，因为诗人特意不止一次地指出，是“上帝给了她更为贫弱的心智”，（590;649）而引诱者又自称是上帝使者，难怪她不能认清其真面目，这自然为她减轻了责任。同时，撒旦的使者非常雄辩，他用了近 40 个诗行（552—87）来“征服”夏娃。他威逼利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逻辑严密，很有说服力，使那个“心智贫弱”而且从来没有被告之为什么不能吃智慧果的夏娃实在难以招架。

由于亚当已经拒绝其诱惑，引诱者才转而去找夏娃。所以这个以上帝使者身份出现

^① 在《失乐园》里，密尔顿以奥古斯丁关于人的自由意志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让亚当独立做出愿意与夏娃一道沦落、共同赎罪的痛苦而勇敢的选择，使他超越了传统局限而成为一个光辉的艺术形象。然而即使在《失乐园》里，夏娃也是一个刻画得更为细腻、性格更为复杂、内心更为丰富的人物。

的诱惑者首先恐吓她说,由于他们不执行他带来的上帝旨意,定将招来全能的上帝雷霆之怒,现在只有她才能救他们俩。他告诉夏娃,如果她按上帝旨意吃了智慧果,她就会心明眼亮,看见天堂之主,得到他的恩惠。这其实是很巧妙地向夏娃提供他是上帝使者的证据:只要她吃了智慧果,就能得到证据(看见上帝)。她吃禁果之后,如引诱者所说,她的确看到了上帝和天堂的美好,因此确信来者是上帝使者。她这才开始劝说亚当,这个证据也因此而成为她说服亚当的重要理由。她告诉亚当,“如果不是上帝,天堂之主,/赐我眼力,我如何能有这般领悟?”(654—55)在她劝说亚当的整个过程中,夏娃强调了引诱者是上帝使者,并特别生动地描绘了她吃智慧果后的美好感受:她看到了上帝无边的创造,听到了美妙和谐的天堂之乐,更瞻仰了上帝的容颜和感受到天使们在上帝身边的幸福与美满。诗人显然是在竭力表明,夏娃完全是真诚地以为她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另外,引诱者还利用了她对亚当的爱情。他说,如果她吃了禁果,“我将不会向你们的主告状,/那个亚当如此无理,竟然对我恶语相向”。(580—81)这也使她的形象更为可爱,她的错误也就更容易得到人们谅解,因为她是在为亚当着想,她的过失中没有丝毫个人利益,更不用说虚荣。

或许是怕人们不理解他的弦外之音,当夏娃劝说亚当之时,诗人甚至直接出面明确地为她开脱说:

她完全出于忠诚意愿,全然不知

无穷的伤害、可怕的灾难

将随之降临到人类头上……

她听信那罪恶使者的规劝,

还自以为是在蒙取天主的恩典。(708—13)

由此可见,在《创世记B》里,夏娃充其量只是好心犯错误:她以为自己是在执行上帝使者带来的上帝旨意。她那由上帝赐予的“贫弱

的心智”(这当然不是她的错)显然无法理解上帝玄奥的天道(Providence)或魔鬼那险恶的阴谋诡计,因此她实际上成了她无法理解的上帝与魔鬼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无辜牺牲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劝说过程中,我们只能感受到她对上帝的爱和虔诚,而没有丝毫虚荣。这显然不是因为诗人不知道基督教关于虚荣的教义。他在前面表现撒旦和天使的反叛和堕落之时已经用了大量的篇幅和超常的语言来突出地表明,虚荣是天使们因而也是随后人类堕落的最终根源。因此,他在表现人类的堕落,特别是在表现夏娃这个关键人物时,在虚荣问题上令人惊讶的沉默显然另有原因。

不仅如此,除了为夏娃开脱,诗人还尽力表现她痛悔的心情,进一步突出她人性的一面,从而使她更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在吃禁果之后,亚当把一切过失推给夏娃并后悔曾请求上帝为他造出夏娃,这使亚当的形象大打折扣。在亚当责骂之后,诗人让这个“最美丽的女人,最漂亮的妻子”说出最动人的话:“亚当,你尽可以用你的语言责怪我;/然而你胸中的苦痛却远不及/我的心正为此遭受的折磨。”(824—26)其实,亚当的责任更大。首先,他的“心智”更强;其次,在此之前他拒绝了使者的诱惑,那表明他本来已经认识到那指令并非来自上帝;但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是他自己吃下的禁果。但亚当把一切责任全推给夏娃,而夏娃却没有任何抱怨,只是在内心自责和悔恨;相比之下,夏娃的形象显然更为可爱。

这样,《创世记B》呈现给读者的夏娃与那个因虚荣而犯罪、长期遭到人们谴责的传统夏娃形象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这个人性化的甚至是凄美的夏娃是一个平凡而可爱的女人,而不是宗教观念的体现者。她诚实、善良、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并为自己的过失

痛感悔恨；她向往天堂而无虚荣，因天真而易受欺骗，因虔诚而背离神意，显然很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夏娃这个形象在英国文学发展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她不仅是第一个独特的夏娃形象，而且是英国叙事文学作品中第一个主要从人的角度而非从宗教教义出发而塑造的具有相当内心深度的人性化了的女性形象。^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诗人虽然是在讲述《圣经》故事，但他对夏娃的塑造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正统的基督教教义。诗人显然是一个教士或修士，如果他在一些细节上稍微偏离正轨，那不足为奇，但在事关人类堕落这样的核心问题上走那样远，则很不寻常。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诗人的“离经叛道”(heterodoxy)，并试图解释其原因。希尔认为，《创世记 B》的作者虽然不能说是“离经叛道”者，但他在“处理人类堕落的事件”上所享有的“思想和想象自由”的确大得“有点令人吃惊”。他的解释是，诗人不是用拉丁这种运用广泛的“国际语言”和宗教界的正统语言，而是用英语这种“范围相对狭小的民族语言”写作，因此不必担心遭到正统宗教人士的攻击。(Hill:290)

这种可能性也许有，但却没有找出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而且这种设想意味着作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着为基督教教义所不容的事，在发表异端思想。也就是说，他是有意地在“离经叛道”，否则他就不必为了避免遭到正统人士的攻击而有意识地使用为主流宗教界人士不能阅读的英语。很难想象，一个教士会有意识地发表异端思想。^② 所以，更有可能的是，这个教士—诗人并不是有意地发表为教会所不容的异端思想，而是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的思想与正统有多大矛盾。^③ 也就是说，他是在按照自己对《圣经》故事的理解，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叙述人类堕落的故事和塑造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夏

娃。这里的关键是他的理解，而他的理解是以他的思想为基础的。那么，这部诗作反映出作者什么样的思想呢？在很大程度上，那是仍然十分强大的日耳曼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 8 世纪，许多来自刚皈依基督教不久的英格兰地区的传教士前往北欧日耳曼地区，成为当地传教活动的主要力量。那些地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居地，虽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已经有了较大变化，但他们与当地人的交流不应该有太大困难，这也可能是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教活动在当地特别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因。《创世记 B》这部被学者们认为产生于 8 世纪的诗作很有可能就是这场传教活动的产物。如果是这样，它要么是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为了向当地人传教而用当地的撒克逊语创作的普及性《圣经》故事，要么是深受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影响、刚皈依基督教的当地撒克逊教士为同样目的而创作的作品。它随后被带回英格兰，翻译成盎格鲁-撒克逊语，并被嵌入《创世记 A》里。

但不论怎样，它都是包括英格兰在内的日耳曼世界早期基督教时代的作品。不仅在刚皈依的北欧日耳曼地区，即使在英格兰，日耳曼异教传统都还保持着强大影响，基督教的控制还没有完全巩固，更不用说确立和普及正统的基督教教义。另外，基督教内部也存在许多各种不同流派和思想的冲突，这自然也影响到教义的统一。比如在英格兰地区，罗马教廷和爱尔兰教会之间的冲突在 7、8 世纪就一直很激烈。因此在相当长时期

^① 古英语英雄史诗《沃迪尔》(Waldere)可能塑造了一个重要的女性形象，然而它只剩残篇，仅两个段落，共 63 行，使人难以看清她的形象。

^② 基督教史上许多发表所谓“异端”思想的人，从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异端”，而且他们几乎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公开场合宣扬自己的观点。

^③ 其实，希尔自己就指出，像比德这样著名的神学家和学者也常常被指责为散布异端邪说。比德恰恰是用拉丁语写作，他显然不会认为自己在散布异端邪说，他的所谓“异端邪说”也只能是不自觉的流露。

内,在英格兰,更不用说在北欧的日耳曼地区,很难说什么是正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教士们往往是根据各自的教派和自己的理解来传布基督教思想。所以,教士们相互指责为异端的情况屡见不鲜,甚至像当时英格兰最杰出的神学家、学者和修道士比德(Bede, 672—735)也常遭指责,说他散布异端邪说。至于后来,随着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正统教义逐渐确立,基督教早期的许多流派和思想、特别是那些受到异教文化影响的思想,被指责为离经叛道就更不足为奇了。

所以,与其说《创世记 B》的作者是有意地在利用所谓正统神学家们不能阅读的英语来表达异端思想,还不如说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背离正统。其实,《创世记 B》虽然是在讲述《圣经》故事,它所讲述的绝大多数内容却没有经文可依。比如,关于撒旦和天使们叛乱的故事《圣经·创世记》里根本没有,它只是在《圣经》其他地方偶尔简略提及。它实际上是后来历代犹太注经家、基督教神学家和文学家们集体想象力的创作。由于它是经外传说,没有太多束缚,所以成为人们发挥想象力的绝好题材。《创世记 B》里撒旦的形象就是一个突出例子,诗人的想象力使这个叛逆者更像一个日耳曼英雄。虽然诗人根据基督教教义着重突出撒旦的高傲并加以谴责,使之成为天使堕落的根源和世间一切罪孽之“原罪”,但在日耳曼价值观念里,高傲或者虚荣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名声、荣誉和地位的渴望并非像在基督教教义里那样是罪孽,相反却是值得赞颂的美德,是英雄们渴求实现的人生目的。所以,当诗人在无意间“赞美”撒旦身上的“英雄”气质之时,那实际上是他自己身上的日耳曼文化传统影响的流露。在对待虚荣或名声上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传统在对待人方面的根本区别。基督教谴责人妄图变得和“神一样”的虚荣,将其斥为万恶之源,这不仅在人

和神之间划了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耶稣除外),而且无情压制了人试图超越自身的一切企图或努力。与之相反,日耳曼人追求名声,通过英雄业绩扬名四海,流芳百世,使自己超越时空,这实际上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许多古英语英雄传说,特别是史诗《贝奥武甫》,都十分突出地表现了这一观念。

实际上《创世记 B》在讲述人类堕落的故事和塑造夏娃的形象时所表现出来的背离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源于日耳曼文化(特别是其中崇尚人的价值方面)的影响。诗人在讲述人类堕落的整个过程中,突出强调魔鬼对夏娃的蒙骗,相反却对虚荣这个在正统基督教教义看来是人类堕落的核心根源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沉默,可能正是这种影响不自觉的流露。至于把夏娃人性化的倾向,就更明显地反映出日耳曼文化中的人文思想的影响。传统的日耳曼文化在本质上是世俗文化,相对于基督教,它更关注的是现实世界、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人的价值。所以,诗人致力于把夏娃塑造成一个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女人形象,有着现实中的女人身上常有的品质、缺点和思想情感,而不是把她塑造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观念体现者,从而把她同撒旦的高傲和耶稣的谦卑寓意性地联系在一起。

在古英诗里,《创世记 B》塑造的夏娃并不是一个孤立形象。虽然大量古英诗已经散失,但现存的盎格鲁-撒克逊诗歌仍然为我们展现了一些动人的女性人物。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女性人物主要出现在世俗诗歌里,^①其中最动人的形象是抒情诗《武尔夫与伊德瓦塞》(*Wulf and Eadwacer*)、《妇怨》(*Wife's Lament*)、《夫之书》(*Husband's Message*)

^① 古英语宗教诗歌也塑造了一系列女性人物,比如圣徒传《朱丽安娜》(*Juliana*)和《爱伦娜》(*Elene*)里的主人公。但需要指出的是,朱丽安娜和爱伦娜与其说是女性人物,还不如说是被非性化了的圣徒。至于在古英诗残篇《朱蒂丝》(*Judith*)里,朱蒂丝倒更像一个日耳曼女英雄。

里的主人公。她们思想感情丰富,历尽艰辛而对爱情忠贞不渝。这些女性形象显然是日耳曼传统文化的产物,她们体现的主要是日耳曼价值观念。所以,夏娃这个形象是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尽管夏娃在许多方面与她们不同,但在突出她的人性和她的女性特点方面,《创世记 B》的作者显然受到了日耳曼文化传统的影响。从夏娃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日耳曼传统对现实中的人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基督教文学中的宗教倾向,从而使人物更加生动丰满、真实动人。

当然,古英诗《创世记》首先是宗教文学作品,讲述的是《圣经》故事,其主旨是表达宗教思想,目的是教育广大听众。因此,宗教精神在作品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宗教诗歌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日耳曼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诗人所表达の日耳曼习俗和价值观念使诗中的世界更接近于日耳曼或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现实,也使其中的主要人物更像现实生活中的人。在反映日耳曼传统的影响方面,古英诗《创世记》远不是个别现象,几乎所有古英语宗教文学作品都受到日耳曼文化程度不同的影响,正如那些直接根源于日耳曼传统的世俗诗歌也几乎全部受到基督教思想的重大影响一样。从古英语文学中的这一重要现象可以看出,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几个世纪里,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传统一直处在共存、冲突与融合的动态关系中,并最终发展成为后来英国文化的核心。 □

参考文献:

- Godden, Malcolm. "Biblical Literature: the Old Testamen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ld English Literature*. Eds. Malcolm Godden and Michael Lap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1.
- Hanford, James Holly. *A Milton Handbook*. Rev. ed. New York: Crofts, 1933.
- Hill, Thomas D. "The Fall of Angels and Man in the Old English *Genesis B*." *Anglo-Saxon Poetry: Essays in Appreciation*. Eds. Lewis E. Nicholson and Dolores Warwick. Notre Dame: U of Notre Dame P, 1975.
- Krapp, George Philip, ed. *The Junius Manuscript*. New York: Columbia UP, 1931.
- Leck, William E. *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 3rd ed. Vol. I. New York: Appleton, 1900.
- 《圣经》。南京:联合圣公会,1979。
- 密尔顿:《失乐园》,朱维之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诗歌传统形成之研究”(04BWW012)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